



2024年8月21日
星期三

第2135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主管主办 网址: http://www.studytimes.cn
报名题字: 江泽民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0137 代号: 1-267

胆识、智慧和远见

——邓小平对制定党的第二个历史决议的重大贡献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 曲青山

今年是邓小平同志诞辰120周年，学习和弘扬邓小平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对激励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具有重大现实意义。邓小平一生为党和人民事业建立了不朽功勋，其中一个伟大历史贡献就是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紧要关头发挥了举旗定向、力挽狂澜、一锤定音的作用。40多年过去了，随着国内国际形势的复杂深刻变化，越来越显示出邓小平作出这一重大战略决策的非凡胆识、高超智慧和政治远见。

邓小平领导制定《决议》的非凡胆识，体现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审时度势作出的果断决策上

历史，往往在经过时间沉淀后可以看得更加清晰。《决议》的起草之所以事关重大，是因为它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前党的历史，总结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经验，对一些重大事件和重要人物作出了评价，特别是正确评价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分清了是非，纠正了“左”右两方面的错误观点，统一了全党思想，对推动党团结一致向前看、更好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重大影响。无论在当时还是今天来看，《决议》所要解决的一系列重大问题特别是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都是关乎党和国家发展方向和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是“国际国内的很大的政治问题”。《决议》是在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呢？总起来说，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解放思想、拨乱反正的历史过程中产生的。在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邓小平从

端正思想路线入手进行拨乱反正，强调实事求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旗帜鲜明反对“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支持和领导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推动进行各方面的拨乱反正，促进了全党思想解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党内外出现了对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历史特别是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进行总结和评价的呼声。

正确认识和把握问题至关重要，解决问题的时机选择同样至关重要。面对党内外的呼声，是否制定、何时制定《决议》，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也考验着党和人民事业舵手人的政治胆识。在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的时候硬要去做，操之过急、草率从事，只会适得其反；在形势发生变化、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逡巡不前、犹豫不决，也会贻误时机，带来严重后果。邓小平作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家的非凡胆识，集中体现在不该制定《决议》的时候急不得，该制定《决议》的时候等不得。

急不得。邓小平一向善于从全局上思考问题，善于在关键时刻作出战略决策。在制定《决议》这个问题上，他认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是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时机尚不成熟，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暂时不要碰这个问题。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当不少干部要求认真总结“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训时，邓小平主张对“文化大革命”的总结不要马上进行，他指出：“文化大革命已经成为我国社会主义历史发展中的一个阶段，总要总结，但是不必匆忙去做。要对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做出科学的评价，需要做认真的研究工作，有些事要经过更长一点的时间才能充分理解和作出评价，那时再来说明这一段历史，可能

会比我们今天说得更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也强调，对于“文化大革命”，适当的时候作为经验教训加以总结，是必要的，但是不应匆忙地进行。1979年党的理论务虚会上，有同志提出希望党中央及早总结新中国成立30年历史，像1945年党的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作出《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那样，作一个关于新中国成立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此，邓小平重点阐述了在中国为什么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根本性的思想政治问题，实际上也就表明了对待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鲜明立场。

等不得。随着拨乱反正的全面开展和改革开放的推开，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议论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一种倾向是一些人受“左”的思想束缚，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表现出某种程度的不理解甚至抵触情绪；另一种倾向是极少数人利用党进行拨乱反正的时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极端夸大党所犯的错误，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不仅党内外非常关心党中央如何评价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问题，国外也非常关注这一问题，并提出种种猜疑。这些状况表明，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评价问题是一个重大敏感而带有国际影响的问题，且变得日益迫切起来。如何既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践和理论，又坚决顶住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思潮，是对我们党领导能力、政治定力、执政地位、国际形象的重大考验。从国内看，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就可以统一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思想，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使党和国家沿着正确的政治方向前进；处理不好，就会造成极大的混乱，葬送安定团结的政治局

面，党甚至会把自己搞乱、搞垮。从国际看，这个问题处理得好，有利于支持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政党和组织的团结，有利于第三世界人民的团结，有利于人类进步事业；处理不好，就可能带来一系列的严重问题。

根据形势变化，1979年邓小平在领导起草叶剑英同志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时提出，这个讲话要对过去30年作一个总结，特别是对“文化大革命”要作出一定的说明，要有一些新的内容，能讲出一个新的水平。叶剑英国庆讲话对毛泽东、毛泽东思想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受到党内外高度关注，引起了良好反响。但这个总结毕竟是初步的，对党内外关注的重要问题不可能详细展开阐述。因此，党内外要求尽快作出一个正式的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呼声越来越高。这个时候，邓小平审时度势、综合研判，认为制定《决议》的时机已经成熟，不能再等了，否则就会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执行。他果断决策，要求以叶剑英国庆讲话为基础，开始着手起草《决议》。他强调：“有了国庆讲话，历史决议就好写了。以讲话为纲要，考虑具体化、深化。”针对有些人认为时机和条件还不成熟，主张不急于作《决议》，希望在召开党的十二大甚至更往后去解决的意见，他指出：“我们必须现在解决，不能由后代来解决，因为他们不了解整个历史。”“这个决议，过去也有同志提出，是不是不急于搞？不行，都在等。从国内来说，党内外都在等，你不拿出一个东西来，重大的问题就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国际上也在等。人们看中国，怀疑我们安定团结的局面，其中也包括这个文件拿得出来拿不出来，早拿出来晚拿出来。所以，不能再晚了，晚了不利。”

(下转6版)

重要言论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一个动态过程，必然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发展，已有制度需要不断健全，新领域新实践需要推进制度创新、填补制度空白。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必须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继续完善各方面制度机制，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加强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和科技型中小企业的金融支持，完善长期资本投早、投小、投长期、投硬科技的支持政策。通过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旨在健全相关规则和政策，推动制度变革，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

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已初步建成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执行的是计划经济下单一的科技投资体制。这种体制发挥了十分积极的重要作用，帮助新中国取得了包括原子弹、氢弹、人造卫星等重大科技成果，成功突破了国外的技术封锁。但与此同时，科技创新的一般规律表明，重大创新往往不是孤立的单点突破，而是难以预知的新群落“涌现”。只有拥有大量“塔基式”的科技创新活动，才可能得到“塔尖式”的科技突破。单纯依靠行政手段配置资源并非科技发展的长久之计，市场化的金融支持对于科技创新活动至关重要。不同主体、不同类型、不同阶段科技创新活动的风险特征千差万别，不同资金供给的风险偏好和承受能力也不尽相同，这就要求金融体系能提供差异化的金融介入路径，构建多元化的科技投入格局。

当前，我国已初步建成包括银行信贷、创业投资、资本市场、政府引导基金等在内的全方位、多层次的科技金融服务体系。银行信贷方面：截至2024年一季度，高技术制造业中长期贷款、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专精特新”企业贷款分别同比增长27.3%、20.4%、17.9%，明显高于各项贷款增速；科技型中小企业获贷率达到46.5%，较2017年末提升2倍。创业投资方面：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5月，我国存续的创业投资基金共24262只，创业投资基金规模达3.26万亿元。资本市场方面：科创板开通5年来，上市企业数量从首批的25家增长至如今的573家，总市值5.19万亿元，首次公开募股(IPO)募资总额累计9108亿元。作为支持“硬科技”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阵地，在科创板上市企业中，属于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等“硬科技”产业占比近89%。政府引导基金方面：有关数据显示，政府引导基金目标规模自

□ 张晓晶

2017年末的9.5万亿元，增长至2023年年中的近13万亿元。

科技金融体制与科技创新的适应性亟待提高

近年来，我国围绕金融支持科技创新，不断强化顶层设计，优化科技金融政策环境，科技信贷规模持续扩大，全面注册制改革落地实施，服务科技型企业的金融产品工具不断丰富，金融支持科技创新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但科技金融供给远不能满足科技创新活动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一是资本市场发展滞后。美国科技实力之所以处于全球领先地位，与其发达的资本市场密切相关。同时，在过去40多年中，美股新上市企业中超1/3是科技型企业，该比例远高于我国。二是高收益债券市场发展滞后。(下转2版)

在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上下功夫

□ 张慧君

好生活需要和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相比，公共服务资源配置效率和供需适配度有待提高，区域、城乡、人群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仍有差距，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和可及性需要进一步增强。

基本公共服务首要原则是均等化，强调机会均等、资源共享和制度统一。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重点在于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和公共服务资源的优化配置，不断缩小区域、城乡、人群之间的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差距，确保社会成员在获得基本公共服务方面享有平等机会和公平结果。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旨在提升供给与需求的匹配程度，既强调空间可及，公共服务设施在空间布局和距离上便利可达，又重视内容可及，使公共服务产品可利用、价格可承受、质量标准化和安全有监管，提高公共服务的使用效率，优化公众公共服务体验感受。

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要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既尽力而为又量力而行。一方面，按照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

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等要求，明确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国家清单及服务标准，以标准化确保基本公共服务“应有尽有”。另一方面，完善地方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保障机制，加大向特殊类型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不断缩小区域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与此同时，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标准统一与制度并轨，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稳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对常住人口全覆盖，确保符合条件的外来人口与本地居民平等享有基本公共服务。

统筹考虑需要和可能，把保障和改善民生建立在经济发展和财力可持续基础之上，重点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基本公共服务能力建设。明确政府、市场、社会在提供公共服务中扮演的角色，既有效回应社会需求，统筹各类资源，稳步提升公共服务保障水平，又合理引导社会预期，形成可持续的基本公共服务支出与成本分担机制。支持社会力量扩大养老、托育、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的普惠性规范性供给，综合服务半径、服务人口、资源承载能力以

及人民群众实际需求科学配置优质服务资源。

城乡基层是距离人民群众最近的地方，也是公共服务需求最为集中的场域。增强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要注重提质增效、均等可及，促进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农村覆盖、向边远地区和生活困难群众倾斜，加快补齐短板、强化弱项、提升质量。以公共服务下沉为重心，构建覆盖城乡的基层公共服务网络体系。着力打造以乡镇（街道）为中心、辐射村（社区）和村民小组（居民小区）、遍及城乡的基层公共服务供给网络，提高人民群众享受公共服务的便利度。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同时，根据不同地区居民的差异化需求，为个性化公共服务“量体裁衣”。

基本公共服务关乎民生、连接民心。不断提高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让基本公共服务下沉基层，在幼有善育、学有优教、劳有厚得、病有良医、老有颐养、住有宜居、弱有众扶等领域持续增进民生福祉，给予人民群众更多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大任务。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要求聚焦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完善收入分配和就业制度，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增强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和可及性，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重要要求不仅为新时代新征程提高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指明了前进方向，也将引导各地政府聚焦人民群众最关心的领域、生活中最关键的环节，推动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全民、兜住底线、均等享有。

民生冷暖，枝叶关情。新时代以来，我国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保障和改善民生，注重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人民生活全方位改善。但我们也要看到，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本期导读

习近平总书记所作的比喻

各族群众要像胡杨一样根连根、心连心

第5版

改革关注点

健全宏观经济治理体系的侧重点

第2版

院士论坛

时空基准：
全球竞相布局的重大基础设施

第6版